



清季民初的学制、 学堂与经学

The School System, School and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朱 贞 著





清季民初的学制、 学堂与经学

The School System, School and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朱 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季民初的学制、学堂与经学 / 朱贞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3429 - 3

I . ①清… II . ①朱… III . ①学制 - 教育史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 ①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9902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清季民初的学制、学堂与经学

著 者 / 朱 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宋 荣 欣

责 任 编 辑 / 邵 璐 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5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429 - 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经学进入学堂与学制	14
第一节 新式学堂与经学	14
第二节 经学进入学制	34
第三节 科举、学堂与经学	49
第二章 制度条文与办学实情	67
第一节 中小学堂读经讲经	67
第二节 高等学堂与大学堂经学课程	77
第三节 师范学堂经学课程	90
第四节 学制规定与实际演化	103
第三章 经学课程的授受与成效	116
第一节 经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	116
第二节 经学教习的选任	131
第三节 经学课程的授受	135
第四节 教授方法的研究与改良	144
第五节 成效与走向	150
第四章 经学教育的变通与调整	169
第一节 学堂体系外的变通	169

第二节 学制框架内的调整	206
第三节 经科大学的开办	230
第五章 经学退出学制	248
第一节 清季预备立宪和学堂读经	248
第二节 民初经学退出学制	291
结语	323
征引文献	327
人名索引	339
后记	343

绪 论

经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学问的大道。清季民初，经学转至若存若亡。以至于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的周予同，在1961年做出“五四运动以后，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判断。^① 经学地位的巨变，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不可谓不深远。究其原因，除了近代学术重心由经入史以及经学无以应世变之外，还与分科治学观念的引进以及推广分科教学的西式学堂关系密切。

蒙文通反思经学在近代的境遇，指出自清末壬寅、癸卯学制出台，西学的分科系统和教育框架就破坏了经学本来的地位价值，“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②

经学退出的问题，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的此消彼长。而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也是自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的科举与学堂之争的主题。经学进出学制、学堂，恰能呈现相关历史进程与轨迹，可说是认识近代经学历史命运的重要途径。

在学堂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最初西学只是作为科举的补充。但在科举制度始终不能安置西学的情况下，清廷决心由科举取士转为学堂育

^① 周予同：《经、经学、经学史》，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59页。

^②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9、212页。

才，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①。由此，经学原本的独尊地位发生变化，进入学堂变成与文、史等平行的一门分科。学堂形式上兼容中、西学，实际上却已按照西式分科治学与设学的办法整合中学。随着晚清壬寅、癸卯学制的先后出台，西式教育体制全面推行，学堂以“中学为体”的方式继承科举的重任。通过各阶段经学课程的设计，经学被全面纳入分科教学的学制系统。但癸卯学制中的规划，在实践中出现较多问题。受到西式观念的影响，在是否需要读经的认识上也渐起争议。

民国建立，经学最终退出了学堂的学制体系。这是经学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阶段性标志。一方面，经学何以退出，怎样退出，到底有没有退出等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探讨空间。另一方面，经学退出后，如何填补维系伦理秩序的道德真空，以及传承中学不使变形，成为相当棘手的难题，不仅造成民初以来政治、思想、学术等方面的纠结与困惑，而且至今仍然考验人们的智慧。

受限于近代教育界与思想界趋新人士的论证，后人对相关史事的认知，常和“复古”、“保守”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这既反映了晚近以来的西化进程，也和经学本身承担维系伦常的功用有关。但如果仅从“以变化为进化”的视角做出判断，晚近社会转型时的复杂面相，诸如中西学的交融碰撞、教育制度的移植变化等问题都会被掩盖。因此，清季经学进入学堂和学制的立意、实际运作及其产生的效果，尚需要进一步弄清。

一 前人研究

近代教育转型，经学传承出现断裂，“从现代学校制度输入中国以后，这读经问题，就老跟着纠缠不清”。^② 学人对于学制、学堂和经学问题的论述，处于分科治学观念形成、确立到逐渐反思的过程之中。因此，前人研究的整体思路又与近代学界分科治学的观念密不可分。

1949年以前，学堂读经问题的讨论常见于教育史著述。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清季民初学堂读经材料的发现和整理。一方面，固有学问被纳入欧美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内解释；另一方面，接受旧学训练的学

^① 本书中出现的“中学”，一般是指与西学相对应的传统中国学问的总称。而对于用以划分教育层级的中等阶段学堂，除了引用的原文表述外，一般明确标示为“中学堂”、“中学校”。

^② 周予同：《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第430页。

人，开始认识到分科办法对于传统学问的破坏。

经学进入学堂，是晚清学制的重要特点，民国时期的教育史研究自然不能绕开这一问题。教育通论性著述在梳理晚清至民国时期教育变迁的脉络时，对于经学进入学堂与学制的过程常有所着墨。由于这些论述大多站在民国时期政体民情的立场考虑问题，新旧观念的划分极为普遍，经学课程的存在，在一些著述中沦为教育界“旧思想”的代表。留美博士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16）认为经学课程的存在是近代新旧教育过渡时期的产物，将经学从学制体系内的退出定位为学校制度的进步。

在对晚近兴学历史的梳理中，学人注意到学堂经学教育的调整和变动。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创立35周年，于1931年编写了《最近三十五年中国教育》，收录了几篇探讨近代教育发展状况的短文。其中吴研因、翁之达关于小学教育的论述，已经注意比较壬寅、癸卯乃至宣统年间修订的小学堂章程中读经讲经课程的设置差异。何炳松在关于大学教育的讨论中，对于清季经科大学的设置立意进行了简单探讨。1934年出版的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兼跨清末与民国两个时间段，材料上依托“各杂志附录的时事日志和几本日本书籍”，依照时间线索探讨了高等、中等、初等三个阶段普通教育以及师范、实业教育的演变，试图从根本把握中国现代教育的产生、演变和失败的原因。对于经学课程的存在意义，以及清季民初经学课程的调整变化，做了一番系统梳理。^①

除了教育史方面的专门研究，民国尊孔读经的各种问题，也引发了对晚近学堂与经学关系的讨论。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等对固有思想的冲击破坏，各种外来的思想杂糅传播，五花八门，让人无所适从。1935年，《教育杂志》就读经问题，围绕是否读经，读什么，哪些人去读，怎样读，在教育的什么阶段开展等方面做了专门的意见搜集。^② 在广泛的讨论中，学

① 作者限于材料以及战事带来的生活动荡，写作该书几经周折。原本在实业教育下还有关于留学教育、教育思潮及教育实际（如青年学运动及学校风潮等）的章节设计，“因为字数的限制，只得割弃了”。

② 《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该讨论实际是1934~1935年《教育杂志》关于读经问题讨论的收集，由时任主编的何炳松先于1935年5月10日作为《教育杂志》第25卷第5号出版发行，1939年商务印书馆选取出版为《读经讨论》一书。2008年，龚鹏程所编的《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将其重新整理出版。

人注意到读经问题与外来教育思想之间的关系，“教育思想之转变，又随时代环境不同而不同。故二千年来所视为不成为问题者，近三十年来忽成为问题”，并对清季民初主张设立与废止经科者的人事变化进行简单勾勒。^①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身处分科治学进程中的学人，开始注意到以西方学术分类衡量中国固有学术带来的影响。1944～1949年，蒙文通撰写了探讨经学问题的三篇文字，反思经学在近代的境遇，指出清末学制出台对经学本身的地位价值造成破坏，^②对于本书的研究思路有重要启示。熊十力检讨中国文化的定位，在1945年出版的《读经示要》^③中分析近代经学衰微的缘由，认为庚子后中国思想界一面欲移植西方制度，一面诋毁固有学术，导致“国人一意自卑，而自毁其固有”。不过，熊十力等人已然不能摆脱分科治学的限制，在讨论固有学术问题时，已经不能脱离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等分科观念的表述方式。

20世纪60～80年代，欧美学界注意到近代教育转型问题。对清季经学进入学制的认识，多站在西方教育制度的立场上，将其定位为晚清变局中旧传统的保存。1965年，列文森出版了《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④，认为清季教育变革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传统的捍卫和对外来挑战的回应。1971年，亚耶士在《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指出，作为癸卯制度设计者的张之洞仍然忠于孔子思想，所以课程中心仍是研读古文。^⑤198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其中关于晚清教育改革的章节由市古宙三撰写，认为中国学制办法既借鉴日本，又注重经学课程的开设，在新制度中保存了旧东西，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都偏向传统。^⑥

始自欧美学界的现代化模式为台湾学界所接受，自20世纪70年代以

^① 《郑鹤声先生的意见》，龚鹏程主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第100页。

^②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据蒙默所述，本文撰于1949年。见《经学抉原》，第209、212页。

^③ 熊十力：《读经示要》，该书1945年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1949年上海正中书局再版。

^④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⑤ William Ayers, *C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⑥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39～442页。

来开展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使得近代各地新旧之间的教育转型情况被广泛讨论。1983年，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一书中，指出新旧冲突影响教育发展，并对民国时期读经现象的存在做了统计，^①有助于了解民初经学退出学制后，各地经学教育的残存状况。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资料的整理出版和观念的解放，中国国内相关研究进展明显。整体而言，随着材料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整体拓展，相关方面的研究不断细化和深入，对于晚清学堂经学教育的看法和视角都有所变化，不再持否定批判态度，立论也趋于中肯。学界对于分科治学的办法也渐有所警醒，开始检讨以分科治学观念看待固有学问出现的问题。

与近代学制相关的人事研究得到展开，学人开始留意到近代教育的行政管理和人事安排对旧学设置的影响。2000年出版的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②一书，详细考察了清末中央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和运转，对于学部因人事变更而对旧学保存态度的转变，中央教育会“废除小学堂读经”议案的争执等问题均有探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为基础，李细珠撰写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③，显示了清季教育改革中时任管学大臣的张百熙、荣庆与张之洞在经学课程设置上的观念差异。安东强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学政沿革与皇朝体制》^④探讨了清季提学使对新的教育体制的考量，涉及提学使整合中国固有学问和西式教育体制的问题。学界对于民初教育改制的讨论也逐渐深入，注意到马一浮对民初经学退出学制的抗议等。^⑤

学界有关科举与学堂之争的研究，通过对新旧教育内容、方式的差异以及接续方式的探讨，加深了对学制经学课程立意的认识。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⑥指出传统教育模式与新式学堂有着培养通才与专门实

①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该书后改名《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由岳麓书社2002年出版。

②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③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④ 安东强：《清代学政沿革与皇朝体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0。后以《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出版。

⑤ 许宁：《马一浮儒学教育理念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并参见刘炜《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读书》2009年第3期。

⑥ 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台北，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

用人才的根本区别。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①一文认为科举制的废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价值之间的最大一次文化断裂。关晓红所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②探讨了立停科举前后相关章程与措施的本意，以及停罢科举后西学输入和保存中国固有学问的冲突，指出新式学堂的办学模式，使培养办事专才成为教育主导方向；癸卯学制规划下的学堂教育，中西学兼容并包的各科取代了专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内容，考试成绩和专门程度取代了偏重道德文章的抡才方式，实际上是中西两套教育内容和检测方式的混杂。但科举停废后，科举的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未能找到有效的接续方式，致使乱象纷呈。

存古学堂作为学制体系外开展固有学问的专门学堂，也由简单的价值评判，转为纳入新教育范畴讨论。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③从学制拟订与国粹学派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清季朝野上下保存国粹的努力，指出存古学堂的开办，明显不同于旧时书院。郭书愚以《清末存古学堂述略》为题开展研究，将湖北、江苏、四川三省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勾勒出来，并将清政府内部办学分歧和各种保存国粹的办学方案进行分析，考察时人对存古学堂的反应和认知，以及在趋新时风影响下存古学堂“顽固守旧”形象的塑造。^④

而对于传统旧学教育主要载体的书塾，近来研究也日益深化。新保敦子「中華民国時期における近代学制の地方浸透と私塾：江蘇省をめぐって」^⑤一文探讨了晚清学制改革，指出初等教育面临着新式学堂和书塾共存的局面。左松涛的博士学位论文《闹塾与毁学：晚清民国的私塾与学堂（校）之争》^⑥考察了从晚清至民国时期学堂与私塾的博弈状态，有关私

^① 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②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③ 《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该文收入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

^④ 郭书愚：《清末存古学堂述略》，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8。

^⑤ 感谢原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提供本条材料线索。新保敦子「中華民国時期における近代学制の地方浸透と私塾：江蘇省をめぐって」狭间直树『中国国民革命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第579～635頁。

^⑥ 左松涛：《闹塾与毁学：晚清民国的私塾与学堂（校）之争》，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6。后以《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三联书店，2017）出版。

塾教学尤其是读经、识字方式的探讨，有助于理解新旧教育内容、方式的差别。

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宽，将进入学堂后的经学问题作为专门对象的研究开始出现。祝安顺《从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观看清末儒学传统的中断》^①一文注意到张之洞从湖北办学、江楚会奏，再到癸卯学制中经学课程设置的历史演进。姜义华在书评中指出科举停废是读经遭到废除的重要因素，由此，经学丧失作为出仕敲门砖的功能，无法再延续下去。^② 20世纪30年代的读经问题，也引发学人关注。罗玉明的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尊孔读经之研究》^③指出，随着政体民情的改变，在教育思想、师资结构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现代教育体制都为学校读经设置了障碍。自2003年以来，日本京都大学的宫原佳昭通过探讨20世纪30年代的湖南教育界与读经运动，试图厘清近代西方教育观念普及下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存状态及其引发的问题。^④

对于经学退出的问题，学人也开始尝试从近代经学教育削弱的角度展开探讨。毕苑《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⑤一文通过考察晚近修身和国语教科书，提出读经、修身是清末官方规定的承担道德教育重任的两种科目，而在新旧道德教育转型的过程之中，国文教育的改革影响了传统知识系统的崩溃和瓦解。王东杰《一国两文：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国民”与“国粹”的紧

① 祝安顺：《从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观看清末儒学传统的中断》，《孔子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姜义华：《湖南历史研究的新成果——读罗玉明的〈湖湘文化与湖南的尊孔读经（1927～1937）〉》，《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③ 罗玉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尊孔读经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

④ 感谢叶倩莹博士提供材料信息。宫原佳昭已发表相关著述有「清末湖南省長沙における民立学堂設立と新教育界の形成について——胡元鄰と明徳学堂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62卷第2号，2003年9月；「清末湖南省長沙における地方教育行政の実態について——提學使吳慶坻と教育界人士との対抗関係を中心に」『史林』第91卷第4号，2008年7月；「民国初期における湖南省教育界の職員選挙と『民意』」「孫文研究」第46号，2009年9月。

⑤ 毕苑：《经学教育的淡出与近代知识体系的转移——以修身和国语教科书为中心的分析》，《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张》^① 注意到晚清简字运动中，以汉字保存国粹、以简字普及教育的双轨制方案的出台，以及语言文字变化对旧学造成的冲击。

学人反思以西式分科办法条理固有学问带来的问题，并注意到晚清学制变革带来的影响。钱穆重新检讨中、西学的关系，在《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中指出，若用西学办法衡量，便没有了传统经学的存在，“若把近代西方学术分类眼光加以分析，《诗经》应属文学，《尚书》、《春秋》应属史学，《易经》应属哲学，《仪礼》是一部记载有关古代社会风俗的书，应属史学与社会学范围。把中国古代五经如是分析了，便不该再有所谓经学之独立存在”。^② 桑兵《民国学界的前辈》^③ 一文探讨了民国文化遗民对于旧学的传承，以及彼时学人对于用西学系统条理中国学问的质疑。其后又在《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一文中，点明“经过清季和民初的两度分科教学与分科治学，中国所有的思想学术文化被按照西洋统系分解重构”，导致此后的中国固有学问有无统系，已然成为问题。^④ 其在《清季变政与日本》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晚近学制改革中，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⑤

综上所述，前人对于清季民初经学进入学制、学堂相关问题研究，个别环节已取得重要进展。尤其随着中外学者对以西方为典范的历史发展观的反思，学界开始检讨单一的以西化为进化的衡量标准，中国学人注意到了晚近分科治学与分科设学办法对固有学问的冲击与破坏。但晚清教育改革涉及面既深且广，学人已经注意到部分相关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检讨。^⑥ 经学地位特殊，近代经学地位巨变，导致中国的知识和道德体系前后两

^① 王东杰：《一国两文：清季切音字运动中“国民”与“国粹”的紧张》，《学术月刊》2010年第8、9期。

^②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3页。

^③ 桑兵：《民国学界的前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④ 桑兵：《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⑤ 桑兵：《清季变政与日本》，《江汉论坛》2012年第5期。

^⑥ 郁汉友：《晚清“新政”的再思考：以教育改革为中心的讨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提出“新政对于清朝本身和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有别”。桑兵则在《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要了解晚清的教育转型，就要去除“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后来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

分，影响深远，本专题的研究尚有较多拓展空间。

其一，就经学进入学制问题而言，经学进入学堂的总体设计、实施贯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调整情况，迄今仍缺少关注与研究，对于时人在旧学传统与新式教育体制对接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尚认识不清。

其二，对于学堂经学课程的讨论，大多是针对小学读经和 20 世纪 30 年代读经问题的讨论。晚近经学在学制中的名义，并不仅仅称为“读经”。依据癸卯学制的规定，各阶段课程名目为：普通学堂中、小学堂“读经讲经”，高等学堂“经学大义”，师范学堂则除此之外，还设有“群经源流”。另外，张之洞还创设了专门的存古学堂来保存旧学。除小学堂读经问题外，对于经学如何融入高、中、初各阶段学堂的整体过程至今仍语焉不详。

其三，就研究视角而言，偏重于官方政令和规章条文，对于人事变迁、社会舆论、执行状况及调整变化的关注不够。晚清学制落到实处，往往面目全非，如果仅凭学制章程，很难解释经学何以从学制中的备受重视沦为最终退出。将经学与学制、学堂的关系纳入晚近社会变迁的整体考察，不仅有助于缺乏旧学训练的今人消除时代隔膜，加深对于前人本意的理解，而且能够综合把握彼时社会各界的反应，避免偏听偏信，进而探究近代学堂读经形象的塑造。

其四，就关注重心而言，对于晚清废经的讨论较多，对于晚近教育改制中反对废经的意见没有重视。后续研究，执果寻因，往往容易陷入裁剪片段的误区。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缺少“后见之明”，所做选择未必全然与后来结果吻合，却也是整个历史场景的组成部分，不能掩盖。就晚清读经问题而言，朝野官绅支持者不在少数。因为立场、态度、知识背景不同造成的观念差异，反映了外来体制因中国实情引发的纠葛，也是探究晚近教育史事各种面相的重要取径。

以上种种，正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所在。

二 研究取径和思路

探究晚近学制、学堂与经学的问题，不仅涉及古今，而且牵连中西，面相复杂，诸多纠葛。限制研究开展的因素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第一，分科问题是探究清季民初学制、学堂与经学问题的肇因，也是

影响本研究开展的窒碍所在。固有学问的本相与今天分科视野下的经学截然不同。晚清以降，学界分科治学与教育界分科设学的事实早已确立，受困于后来的教科书知识体系，习惯于以历史、文学与哲学的眼光去看待经学，难以理解经学于传统存在的意义。此外，不同视角下的分科看法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看法也未必截然不变，容易产生误读。

第二，附会带来的纠结，给史事的厘清带来迷雾。探究晚近教育史的困难在于古今教育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断裂，面对过去很难避免不受后来观念的影响。正如张荫麟所说，“夫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① 以传统比附西制，以经学比附新知，再加上东学在沟通中西上的多一层附会，让相关问题很难驾驭。

因此，本书在研究思路上，对于以分科眼光看待中国固有学术文化先有充分的自觉，去除以变化为进化的后来观念，探究经学进入学制、学堂相关史事从无到有直至退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把握经学进入新式学堂后出现问题的根源以及彼时各种尝试解决问题办法的考虑所在；梳理国人认识、接受西学和西式教育制度并加以内化的过程，同时注意学制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变态的互动关系，借以把握近代教育转型的渊源流变以及转型后的利弊得失。

就材料而言，晚近史料的极大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提供了挑战。材料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则结论难免偏于一隅。晚清官方纂修的史书、政书，报刊舆论，私人文集、日记、书信等，都留下了大量清季民初经学进出学制和学堂的记载。

一方面，教育史资料的出版，不断推陈出新。舒新城于民国时期编成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华书局，1928）是较早的教育史料类专书，后经增订修补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三册。丁致聘编的《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国立编译馆，1931）则是一部编年体的教育记事。1934年与1948年，彼时教育部分别编纂了《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与《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

^① 《文学副刊·燕京学报第三期·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1928年7月9日，第9版。

务印书馆, 1948)。1972~1976年, 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台北, 文海出版社), 其中“清末编”以影印方式收录了壬寅、癸卯学制的章程条文, 以及《学部奏咨辑要》和光绪、宣统新法令中教育条目的辑录。1983~1993年, 朱有璣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陆续出版, 对于各个时期的教育章程皆有收录, 且注意报刊、文集相关记载的搜集。此外, 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1987)以及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共十分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1997)也补充了相关材料的细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近代统计资料丛刊》(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第28~33册收录了清季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上述资料, 蕴含了大量关于清季学制变革下经学教育的信息, 却解读不够。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教育史材料的编纂体例, 经学相关内容常被打散进不同阶段的学堂中, 需要整体考察, 而不能割裂去看。不然, 容易忽略经学课程整体设置的立意所在, 难以把握癸卯学制在内容程度上的衔接安排。

另一方面, 新的资料不断整理出版, 提供了相当多的材料和线索, 丰富了历史研究的细节。

官方政书和史书中收录了大量清季学务章程颁布和调整情况的资料, 各种已刊、未刊档案可补充教育政令发布及变化的脉络。此类材料毕竟是官样文章, 而且在史实叙述的连续性上不免有所断裂。所以探讨清季民初新式教育的引进、学制的建立及其影响, 不能忽略报刊的使用。清季民初出版的报纸杂志, 种类繁多。而考察清季新式学堂中经学课程的具体实施状况, 则不能忽略官报。除了《学部官报》外, 直隶、湖北、河南、云南、四川、湖南、吉林、浙江、江西、甘肃、陕西、贵州等地先后创办了教育官报或学务官报。官报中各地视学员的教育调查, 能够大致反映清季学制颁布以后, 经学课程在各学堂的实际执行状况, 以及各地学堂办理时对于中、西学的实际定位。官报之外, 其余民办与外资类报刊对于清季学制变革也留下了大量的报道评论。《警钟日报》、《申报》、《时报》、《大公报》、《香港华字日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国粹学报》等报刊上的言论, 信息杂乱而零散, 反映情况也因取向而各有侧重, 详细比勘各种报道, 有助于展现彼时整合固有学问于新式学堂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近人的文集、年谱、书信、日记、回忆录等, 有助于丰富历史研究的